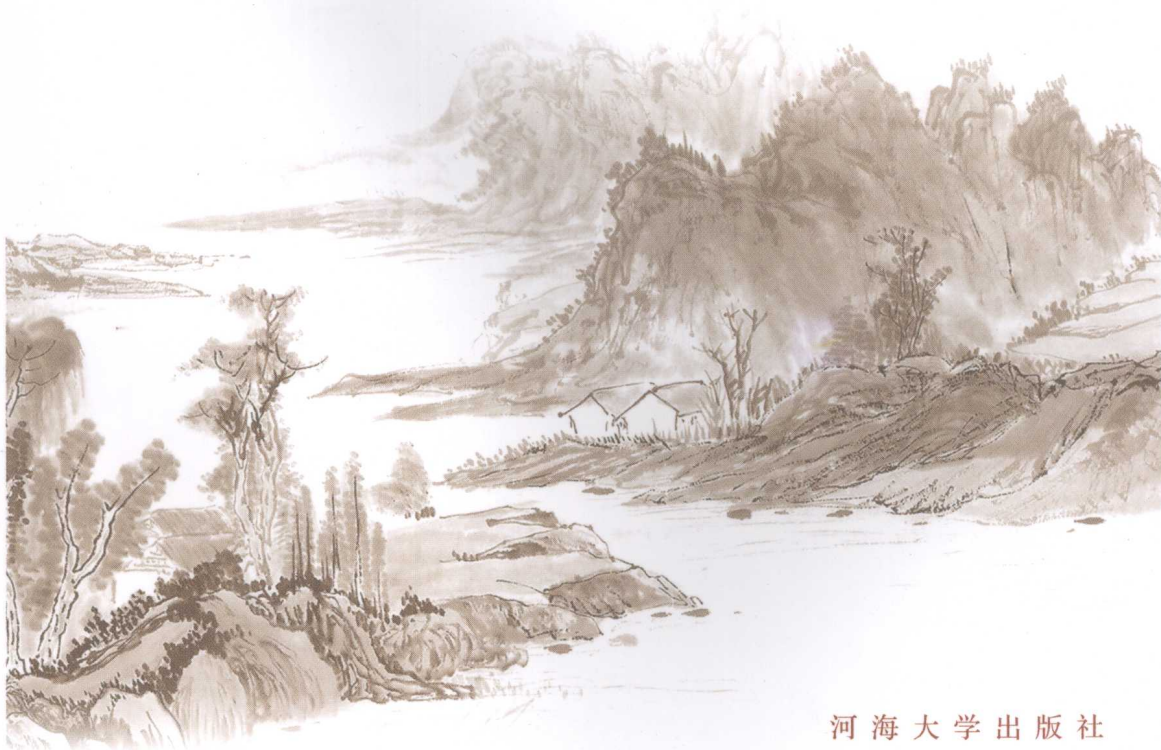


主编◎胡秋宏

大学语文

综合教程



河海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

综合教程

主编 胡秋宏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继宗 刘志庆 杜坚敏 曹洁萍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综合教程/胡秋宏主编.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630-2485-8

I. 大… II. 胡… III. 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H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7741 号

- 书 名 大学语文综合教程
书 号 ISBN 978-7-5630-2485-8/H·192
责任编辑 铁 路
责任校对 刘 青 李 妍
策 划 吴志雄
封面设计 杭永鸿
出 版 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电 话 (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发行部)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20.25 印张 38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大学语文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门重要文化基础课。它对于学生学好其它学科,启发思维、开拓视野、提高阅读水平与审美能力,增强思想道德素养和人文科学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形势喜人,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团队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成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当务之急,大学语文理应承担起人文教育的重任。近几年,我们全面实施了高职语文教学改革。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我们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应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常识,了解上下五千年间中国文学变化、发展的轨迹,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从而培养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理解、欣赏、表达能力。同时,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必须掌握常用的应用文写作技巧,提高应用文的写作能力,并学习各类口语表达常识,提高口头表达能力,陶情养性,文理贯通,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在语文教改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本书的编写,并以中国文学常识、文学作品选、应用文写作、口语训练作为本书的四大板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前人和同行的诸多研究成果,一些注释也颇多借鉴采用,在此谨表谢忱。由于编者自身水平的局限,成书时间的仓促,书中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学常识	001
第一节 先秦文学	001
第二节 秦汉文学	01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	020
第四节 隋唐文学	030
第五节 宋辽金文学	044
第六节 元明清文学	057
第七节 近现代文学	080
第二章 文选	084
中国上古神话三则	084
女娲补天	084
夸父逐日	084
精卫填海	085
氓(卫风)	085
蒹葭(秦风)	087
秦晋殽之战	088
召公谏厉王弭谤	091
冯谖客孟尝君	093
先秦诸子语录	095
《论语》	095
《孟子》	097
《大学》	099
《中庸》	100
秋水(节选)	101
湘夫人	103
垓下之围	105

陌上桑	108
十五从军征	109
上邪	110
明月何皎皎	110
短歌行	110
悲愤诗	112
归园田居(其一)	114
饮酒(其五)	115
西洲曲	116
《世说新语》(三则)	117
过江诸人	117
雪夜访戴	117
石崇与王恺争豪	118
滕王阁序	119
登幽州台歌	124
春江花月夜	125
山居秋暝	126
燕歌行	127
从军行(其四)	129
将进酒	129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31
秋兴八首(其一)	132
登高	133
长恨歌	133
定风波	137
江城子	138
八声甘州	139
醉花阴	140
沈园(二首)	140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141
摸鱼儿	142
山坡羊 潼关怀古	143
双调·夜行船 秋思	144
西厢记(节选)	145

牡丹亭(节选)	149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153
宝玉挨打	163
风波	171
雨巷	176
再别康桥	178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180
听听那冷雨	181
给云雀	185
致大海	189
麦琪的礼物	192
桥	196
第三章 应用文写作	198
第一节 计划	198
第二节 总结	201
第三节 自荐书	206
第四节 调查报告	213
第五节 经济合同	219
第六节 通知	226
第七节 可行性研究报告	232
第八节 招标书	235
第九节 投标书	238
第十节 起诉状	241
第十一节 上诉状	245
第十二节 学术论文	249
第十三节 毕业论文	258
第四章 口语训练	262
第一节 交谈	262
访问与接待	262
批评与赞美	269
说服胜压服	277
推销有诀窍	279

第二节 演讲	283
第三节 辩论	298
例文导读	309
参考文献	315

第一章 中国文学常识

第一节 先秦文学

一、上古神话与上古歌谣

1. 文学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要追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中国古代的先民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在和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不能理解和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和困惑,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因归之于神的意志和威力。先民们借助幻想来表达希望和心愿,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故事和人物通过口耳相传,一代一代流传开去。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原始人类是群体劳作的,在劳动中常常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这种自然健康的韵律成了诗歌的起源。在有节奏的呼喊声中,再加上一些语言,形成彼此互相唱和的词句,这就是最早的歌谣,也是诗歌的最原始形式。上古时代,没有文字,没有书面创作,不可能出现单纯的文学作品,人们往往边劳动,边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谣是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直到较为完备的乐器和文字出现以后,音乐、舞蹈与诗歌才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2. 上古神话的特点

上古神话实际上包含神话和传说两种成分。神话虽然出自人们的幻想虚构,但这种幻想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是客观世界和生活经历的反映。传说则更加明显地凸现出历史的痕迹。《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神话,明显地反映了原始人类同自然做斗争的曲折经历。我国上古神话中描绘的英雄人物,在自然界的大灾难面前,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超自然的力量,《山海经·北山经》中精卫的故事,《山海经·海内经》中描述鲧、禹父子两代人战胜洪水的传说都体现了上古先民勇于斗争和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

从古籍中所保存的神话来看,我国上古神话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除了表现人与自然的斗争外,还有反映早期的人民在海上捕鱼为生的情景,有反映原始人的生产工具、生产状态和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人物,如伏羲、神农、黄

帝、大禹等等,以及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中国古代产生过大量的神话故事,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各种神话故事、神话人物之间,关系相当松散,各自都是以片断的形态记载和流传下来的。

中国上古神话丰富瑰丽,充满奇情异彩。在描述规模较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性事件时,具有磅礴的气势。在表现英雄人物伟大业绩时,穿插了优美动人的情节和充满情趣的生活片断,富有抒情的意味。因而,它成为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神话中所浸透的浪漫主义精神,启发了历代许多作家的想象力;神话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形象。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都从上古神话中得到许多艺术灵感和启发,屈原的楚辞、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歌、魏晋的志怪小说,一直到明、清描写狐鬼神妖的作品都是与古代神话一脉相承的。

3. 上古歌谣的特点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最初的歌谣与音乐、舞蹈同时产生,混为一体。《吕氏春秋》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投足是一种舞姿,三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歌咏祖先的由来,草木五谷的生长,这是原始歌舞与音乐相结合的最好证明。上古时期在没有产生任何记录语言符号的时候,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成为原始人文学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

《弹歌》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描述了从制作弓箭、发射泥丸到打猎的全过程:“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显然,原始人的歌舞是一种生产行为和意识的模仿,带着实用的功能,和生产劳动实践密不可分。

原始人因为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在和自然现象做斗争的时候,幻想用音乐、歌舞影响自然界,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诗歌的发展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关系。

二、《诗经》

1. 《诗经》的产生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诗三百”,汉代学者奉它为经典,后才称为“诗经”。关于《诗经》的产生有多种说法。汉代学者认为,周王朝有专门采诗的人,到民间搜集民歌,以了解时政、世风、民情。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民歌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国语》中曾提到公卿列士向周天子献诗,后人由此推断,“雅诗”和“颂诗”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这些说法都有一

定的道理。《诗经》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又很广,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诗经》各篇的用韵规律基本一致,形式以四言句为主,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定,《诗经》中的诗大都是根据民歌整理、编纂而成的,少数可能是公卿列士的个人作品。

《史记》云:“古者诗三千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但这一记载遭到普遍怀疑。《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不会在孔子出生以后。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反复提到“诗三百”,证明孔子所见已是三百余篇的本子。自春秋以来,战乱频仍,《诗经》的乐章发生了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了鲁国,对《诗经》的乐章进行过整理;他还用诗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诗,并且强调诗的实际用途,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汉代人才会把孔子附会成为《诗经》的最后删订者。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个学派,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稍晚出,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自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而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了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2. 《诗经》的内容

今天所见《诗经》中的作品,依次分为“国风”、“雅”、“颂”,三个部分。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说来,“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在西周时期,“国风”大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周颂”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是周王室祭祀宗庙的乐歌,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有的是赞美周王朝祖先功德的颂歌,有的是在春夏之际向农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答谢神佑的祭歌,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朝农业社会的特征。“鲁颂”和“商颂”晚于“周颂”产生,多为宗庙的祭歌。

“雅”根据音乐特征和应用场合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共31篇,“小雅”共74篇。“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的少数篇章,是用在宫廷朝会宴飨时的乐歌,除了宣扬神权、君权至上,粉饰太平以外,有的还展现了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历史,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有的含有规谏劝喻的意思,正面教训统治者不要重蹈殷纣王的覆辙,由单纯对君、神的颂扬,开始注意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统治阶级生活内容的描写,如《文王》、《荡》等篇。“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产生在周王室衰微到周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政治腐朽,外患严重,诗的作者对现实比较清醒,对当权者的昏庸持有批判

态度,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桑柔》揭示的是动乱中人民的死丧离散,《北山》写出了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抑》攻击了执政者的倒行逆施,《十月之交》则直接揭露幽王身边奸臣和褒姒相勾结而造成的天时不正、政治昏暗。

“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160篇。“国风”中的民歌保存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比“颂”、“雅”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国风”的作品主要有这样几类:一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他们的不平 and 抗争的诗。《硕鼠》是对贵族无穷盘剥的嘲讽和控诉,《鸛羽》、《式微》、《击鼓》是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发出的痛苦呻吟,这些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尖锐矛盾。二是以婚姻恋爱为主题的诗。这在“国风”中占有较大数量。《静女》、《将仲子》是率真、淳朴的恋爱生活的表白,《狡童》、《泽陂》、《葛生》描写了恋爱受阻或失恋的痛苦,《谷风》、《氓》则是被遗弃妇女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诉说。“国风”中写恋爱婚姻的民歌,或歌唱了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描述了幽会场景、微妙心理;或感叹婚姻的不幸。它们感情丰富,亦庄亦谐,艺术成就非常突出。三是表现劳动生活场面的农事诗。如《七月》、《桑中》等篇再现了那个时期农夫们耕作收获、种桑养蚕、纺麻织丝的劳作场面。四是讽刺和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的诗。如《新台》、《南山》、《相鼠》等无情地鞭挞了统治者的丑恶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了一批战国竹简,上面有关于《诗经》的重要记载,在诗的顺序、用字、篇目等方面,与今本《诗经》有不同之处。今本“国风”、“雅”、“颂”在竹简上记为“讼”(通“颂”)、“夏”(通“雅”)、“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除今本305篇外,竹简还载有佚诗6篇,另有40首诗曲的篇名也与今本有所差异。

3.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一句,既比较平稳又比较简单,适合配乐吟唱。但又不拘泥于四言的定格,夹杂有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基本上是隔句用韵,显得错落有致,吟诵起来有自然的节奏。《诗经》常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并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以获得声韵上的美感,造成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效果,强化了感情抒发,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雅”和“颂”中多用这种方法。“比”就是比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或以声喻,或以貌喻,或以事喻,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兴”的本义是“起”,就是借助其

他事物作为诗的开头,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作为起兴的句子有的可能和下面的句子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但它可以引出下文,使人避免产生突兀的感觉。有的起兴句和下文有直接联系,起着比喻、象征、烘托的作用,兼有“比”的特点。《诗经》赋、比、兴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宏伟的高峰。《诗经》的作品大都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传达了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它们以日常生活、时政现状、平常人物作为诗歌的中心素材,以质朴的语言、生动的手法加以表现,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先秦散文

1. 散文的萌芽

中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没有文字,已有诗歌,而散文的产生则以文字的出现为必要条件。

殷代宗教迷信风气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家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祸福,以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当时从事这种活动的有巫和史两种人员,他们通过卜筮的方式代表鬼神发言,凡是占卜的结果、国王的重要讲话,都以书面语言的形式,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在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发掘出的殷代甲骨文,主要记载了卜筮用的卜辞,这可以被看做是记叙散文的雏形。

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周朝的史官开始在简册上记录文告和策书,汇编成集,即为《尚书》,《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当时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稍后产生的《春秋》即是以记事为主的史书。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最初的散文都很简短、精练。殷商时代还有一种铸在铜器上的铭文,这种铭文到了周代有所发展,长达数百字,文体上与《尚书》相近,数量也不少。由此可见,当时散文的应用范围已经很广。

由古代的《尚书》到《春秋》以至于《左传》、《国语》、《战国策》,这是一条历史散文发展的路线;由《老子》、《论语》到《墨子》、《孟子》、《庄子》等,这是一条诸子散文发展的路线。随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不断进步,散文的质与量、形式与内容、修辞与布局,也都不断发展,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典型。

2.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基本上是史官保存的文件汇编,《春秋》虽经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了史官记史的体式。战国初形

成的《左传》、《国语》也大量利用了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治史,描写的成分加重。再后的《战国策》主要是士阶层的个人著作了,融进了许多纵横家的思想。古史“记言”与“记事”的区别,在《尚书》和《春秋》之间还是截然分明的,后来的历史著作在“记言”和“记事”上渐渐混淆了,而且文学成分越来越显著。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帝王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和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原书100篇,今存58篇,后来儒家尊之为经典,也称《书经》。《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的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有很大不同,加之年代久远,传写讹误,有些部分艰涩难读。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现今流传的《春秋》是经过孔子整理修订的,因而也成为儒家经典。《春秋》以纲目式记史,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严谨精练,作者的褒贬倾向不露声色地寓于字里行间,这种微言大义的写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关于《左传》的作者,历来说法有分歧,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所著,但唐代以后有人对此有怀疑。《左传》的内容,主要是春秋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其次是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之事。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和描写人物时,反映出了近于儒家的政治与道德倾向,赞美了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也鞭挞了一些暴君,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明而又极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作者善于运用生动精练的语言,叙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描写人物时,注重人物性格的前后发展,抓住人物的语言、行动和一些传神的细节刻画出人物不同的性格。外交辞令写得非常精彩。或简而精,或曲而达,或婉而有致,富于形象性。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著。但后人多有异议。总体上说,《国语》叙事平缓,文字质朴,不如《左传》有文采,但有些篇章也很有文学特点。

《战国策》共33篇,杂记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作者不详。可以认定《战国策》是汇集而成的著作,不是“一家之言”,但纵横家的思想贯穿其中。汉代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记载了纵横家的政治活动和谋臣策士的说词、争议和论战,尤其记载了士的政治活动和侠义之举,具有时代特色。《战国策》文章有的流畅犀利,有的委婉尽意,有的巧设比喻以说清道理,有的借寓言故事来阐述旨意。文风铺张扬厉,且有论辩色彩。描写人物不似

《左传》简笔勾勒,而是更为具体细致,生动活泼。

3. 先秦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风云激荡,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纷纷亮相,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等十家,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这些学派的学者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被后世称为诸子散文,主要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虽然是理论文章,但是其中一部分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论语》产生在春秋末年,记录了孔子的言行,是儒家的经典。孔子(约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和一生活活动,主要见于《论语》中的记载。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治上主张“礼治”、“正名”;社会伦理上提倡忠孝仁爱;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论语》由孔子的学生辑录,是语录体散文,基本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不加充分的论证,善于通过对话展示出人物的个性。灵活运用各种虚字,委婉曲折地传神达意,有一种雍容含蓄的风格。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邹人,是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孟子》中的文章是孟子和他的门徒共同完成的。虽然仍属语录体,但较《论语》有很大发展,不以简约含蓄取胜,而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文辞酣畅淋漓。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主张观点,在激烈的辩论中,手法灵活多变,经常用比喻、寓言来引导对方,阐述哲理。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早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因观点分歧,创立了与儒家相对的墨家学派。墨子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倡“兼爱”,主张互爱互利;提倡“非攻”,反对侵略掠夺;提倡“尚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非命”,反对听天由命的思想。这些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为了同当时盛行的儒家学说争辩,文章十分讲究逻辑,论证严密,说理透彻,对后代辩论文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生卒年不详,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在这篇约5 000字的文章中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并以精练的言词和多姿的文采表达了宇宙万物普遍具有的相互对立、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特性,字里行间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富于智慧魅力。与哲学思想相应,老子还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庄子(约前 369—前 286),名周,宋国人。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主张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庄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对现实极端不满;又无法反抗,不得不遗世隐居,玩世不恭。《庄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具有独特风格,它吸收神话创作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来阐明哲学道理,形成了想象奇幻、气势开阔、辞藻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庄子散文是先秦散文中最具文学品质的创作,达到了上古散文艺术的高峰,对后世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甚大。

韩非(约前 280—前 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现存著作《韩非子》共 55 篇。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治”思想、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慎到的“势治”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统治理念。所谓“法”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制度;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统治百姓的手段;所谓“势”就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文章条理分明,议论透彻,语言犀利,风格峻峭,尤其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据来论证和阐释比较抽象的道理。

思想方面,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儒家的人世精神有积极的一面,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悲观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又是清高雅洁的,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

文学方面,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汉初的政论散文是从荀子、韩非子等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魏晋南北朝的散文无不受老庄思想和文风的影响;唐宋的古文家尤为推崇先秦诸子散文,从思想和文章都吸收了它们的精髓。

四、《楚辞》与屈原

战国后期南方楚国出现的新的抒情诗歌样式“楚辞”,标志着我国诗歌发展的进步与成熟。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方特点和神话色彩。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以一种适于表现复杂思想感情的、较为灵活的、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的形式出现。楚辞深深根植在楚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土壤里,以它较强的个体意识、奇幻华丽的表现形式和深刻表现时代的特点,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著名诗人都从楚辞获得营养,丰富了自己作品的思想性,提高了艺术表现技巧。

楚辞作者除屈原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一生的历史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做斗争的历史,他悲愤的诗作,一字一句都倾泻了其深沉的爱国情感,成为千古传诵的杰作。他的作品激情澎湃,气概非凡,想象奇特,辞采清新,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优秀代表。

1. 楚辞的形成

楚辞是《诗经》之后出现在长江流域的新诗体,以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创作为代表。“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而《离骚》又是屈原的代表作,所以后人又把楚辞这种诗体称为“骚体”。汉代的目录学家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纂成册,题名为《楚辞》,以后,“楚辞”又成为一部诗集的名称。

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长江流域文化的代表,宗教、艺术、风俗等都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春秋以来,楚国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许多南方学者到北方去留学,北方的士人也到南方游历,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诗》、《书》、《礼》、《乐》等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这种南北融会的文化传统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楚辞的形成,同楚国的民间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歌谣在末尾用语助词“兮”,后来为《楚辞》大量采用。《楚辞》虽脱胎于楚国歌谣,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楚国歌谣句式较整齐,且简短,语言质朴;《楚辞》则句式长短不一,篇幅也多长篇巨制,辞采华丽,更适合于表现复杂的内涵和丰富的感情。

楚地盛行的原始宗教乐歌“巫音”对《楚辞》创作有直接影响。楚人祭祀时,由服饰鲜丽的女巫在祭坛上装扮诸神,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以取悦诸神,歌词内容多为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屈原的《九歌》等一些作品的前身就是这种民间祭祀的乐歌。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诗经》的四言句式,纵横家为游说而形成的华丽铺陈的文辞都对《楚辞》构成一定的影响。

2. 屈原的生平

屈原(约前 340—前 277),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人。屈原出身于没落贵族,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卓越才能和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二十几岁就出任楚怀王左徒,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起初,楚怀王很信任他,在“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关键时刻,他曾多次出使齐国,扩大外交,合纵抗秦。但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以怀王之子子兰等贵族为代表的亲秦派对屈原极尽诬陷诽谤,致使昏庸不察的怀王把屈原逐出朝廷,流放汉北。怀王死后,顷襄王继立,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以谗言诋毁屈原,顷襄王又放逐屈原于江南。公元前 277 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屈原痛感国家前途的黑暗和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于当年五月自沉于汨罗江而死。

3. 屈原的创作

屈原的作品,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是 25 篇,为《离骚》、《九歌》(11 篇)、